

中国

5 编辑春秋——著名出版家、编辑家业绩回顾 / 编坛往事录

当代 出版 史料



大象出版社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 编

1949 ▶ 1999

中国

编辑春秋——著名出版家、编辑家业绩回顾 / 编坛往事录

当代 出版 史料

1949 ▶ 1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宋应离等编.—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9

ISBN 7-5347-2364-7

I.中… II.宋… III.出版工作-史料-中国-1949~
IV.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769 号

第五卷

责任编辑 张焕斌

大象出版社出版(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434 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 册 全套(共8卷)定价 275.8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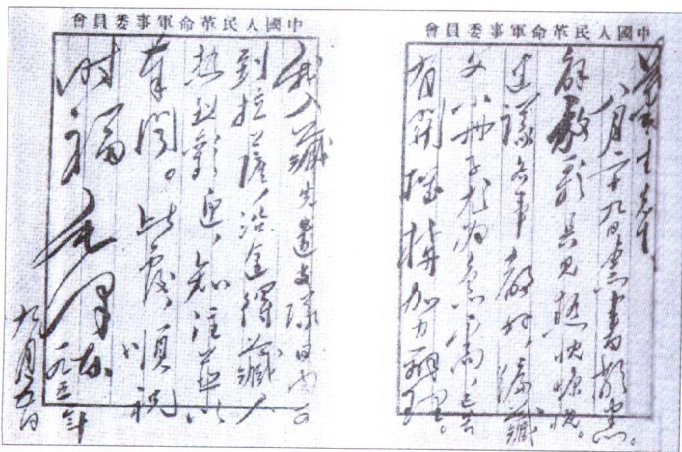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5957860—351



1▶毛泽东和张元济同游天坛(1949年9月19日)



2▶毛泽东给张元济的信(1951年9月)



3 ►毛泽东同胡愈之等交谈(1956年)



4 ▶ 1979年叶圣陶（中）、胡愈之（左一）、王子野在一起



5▶首届“韬奋出版奖”发奖大会（1987年9月9日）

目 录

编辑春秋

——著名出版家、编辑家业绩回顾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论张元济的编辑活动兼谈在文化史上的影响 刘光裕(3)

中国近代出版经营管理的开拓者

——论张元济关于出版经营管理的思想 郑学益(18)

先父张元济的最后10年 张树年(26)

叶圣陶与编辑工作 彭加瑾(31)

悼念茅盾同志 巴 金(48)

我的主编茅盾 叶君健(51)

人民出版事业的先驱者——胡愈之 王仿子(55)

我们的楷模

——记胡愈之同志与《新华月报》 王子野(63)

回忆伯父在出版总署的工作 胡序介(66)

自叙经历 曹靖华(72)

出版家和出版史家张静庐 俞筱尧(87)

文苑繁茂忆园丁

——胡风编辑活动纪略 华 然(97)

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

——纪念雪峰同志 王士菁(119)

我所知道的冯雪峰 胡愈之(142)

夕阳,仍在放光发热		
——追忆雪峰的晚年	陈早春	(150)
一个无私无畏的人		
——忆丁玲	胡真	(171)
生命花朵的绽放		
——巴金的编辑思想及其特点	陈思和 孙晶	(178)
赵家璧的欣慰和遗憾	倪墨炎	(190)
杰出的编辑出版家		
——追忆赵家璧先生	陈子善	(195)
回忆出版家黄洛峰	马仲扬 苏克尘	(199)
印须我友		
——记一代名编辑周振甫	黄伊	(211)
乔木同志关怀出版工作	王益	(218)
缅怀乔木同志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宋木文	(221)
胡乔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	刘志荣	(230)
中国现代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姜椿芳		
	黄鸿森 张曼真	(235)
回忆金灿然同志	李侃	(249)
孙犁怎样当编辑	罗维扬	(257)
陈翰伯同志对出版工作的重大贡献		
——《陈翰伯出版文集》补遗	宋木文	(268)
“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		
——秦兆阳谈文学编辑工作	何启治	(283)
磨稿亿万字 多少悲欢泪		
——缅怀秦兆阳先生	李频	(299)
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王子野	吴道弘	(307)
编编写写 50 年	王天一	(315)
我所认识的韦君宜同志	黄秋耘	(323)

缅怀和感谢·····	王 益(329)
实事求是 不倦追求	
——记老出版家华应申和王益·····	愈筱尧(334)
忆萧也牧·····	秦兆阳(342)
默默的奉献	
——记老编辑常君实先生·····	亦 清(348)
我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丁景唐(357)
为出版的一生	
——回忆边春光同志·····	阙道隆 蔡 云(370)
边春光与文学出版工作·····	王维玲(381)
“韬奋出版奖”第1—5届获奖者简介·····	(393)
“韬奋出版奖”首届获奖者简介·····	(393)
“韬奋出版奖”第二届获奖者简介·····	(403)
“韬奋出版奖”第三届获奖者简介·····	(406)
“韬奋出版奖”第四届获奖者简介·····	(410)
“韬奋出版奖”第五届获奖者简介·····	(422)

编坛往事录

郭老为我们改稿·····	杨牧之(433)
《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	姚雪垠(436)
老舍先生为《我的前半生》改稿一事纪实·····	于浩成(476)
老舍和我·····	赵家璧(479)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孙 犁(490)
给《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作者徐登明的信·····	叶至善(496)
关于《红旗谱》的通信·····	张 羽 梁 斌(499)
我与《红岩》·····	张 羽(503)
夏公来信·····	袁 鹰(540)

编辑春秋

——著名出版家、编辑家业绩回顾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论张元济的编辑活动兼谈在文化史上的影响

刘光裕

张元济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编辑家、出版家。他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出版事业,默默地奋斗了一生。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张元济有不平凡的一生。读中国近代史的人,往往不注意在戊戌年(1898)的“百日维新”中,有一位与康有为同日被光绪召见的张元济。在变法图强、拯救国家方面,他的热情不下于当年任何先进的中国人。因此,戊戌变法失败后,立即受“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位 1892 年的进士,曾任六品朝官,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四年,即 1902 年,在上海毅然加入一家以经营印刷为主的当时毫不显眼的企业——商务印书馆。这或许是因为他生性喜欢默默地勤恳做事情,愿把自己对祖国的爱,变成那种脚踏实地的工作。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是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中,常见这样一类人物。从此,他不插足政界,一生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他被公认是商务的灵魂。在他手中,商务迅速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在远东负有盛名的出版企业。论学识,他学贯中西,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学术,涉足任何领域都可能取得重要成就。但他放弃了自己的著述,决心以传播文化为己任,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他的亲密朋友纷纷通过商务的传播而名噪一时,成为学术界的巨子,他亲手培养的青年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文化界的名人。而他的 60 年漫长岁月,不断用自己的心血去浇灌几代学人的心田,惠我中华学子;

以自己的奋发工作去促使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去影响人们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只是在重著述而轻传播的观念中,他的名字暂时被后人遗忘了。历史总是公正的。在冰心的心目中,他是“传播知识的大师”(冰心:《我与商务印书馆》)。茅盾更断言,“将来的历史将纪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茅盾:张元济 90 寿辰《贺词》)。他的全部功绩,只能由中国近代文化史来作出评价。至于本文,仅根据有限材料,谈谈他在编辑活动中值得重视的几个方面。

在积极传播新学的同时,重视流通古籍。一生努力沟通中西文化,又始终以热爱祖国和革新社会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1902年,张元济35岁时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以后历任商务经理、监理、董事长等,直至逝世。就商务的企业经营活动而言,早期以夏瑞芳等人的贡献最大,而在编辑出版事务方面,张元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商务印书馆是资本主义企业,它自然是要赚钱的。不过,张元济之加入商务,却不能说就是为了赚钱。如果是如此,那为什么在此之前,他辞掉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总理(校长)这样的职位?为什么后来清政府接连任命他去做邮电部参议和学部副大臣,一封封电报飞来均遭他拒绝?1911年,他曾这样说:“鄙人于丙午(1906年)复职以后,始终未入宦途……若欲得钱,取不义之财孰有如做官之便者?”(1911年10月18日《民立报》)“欲得钱”,当然是不如去做官,他又何必要加入商务?“未入宦途”,大概还与他的经历和个性有关;至于加入商务,却是另有旨趣。

“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这是张元济1952年在《别商务印书馆同人》一诗中说的话,表明了他一生从事编辑出版活动的目的。当初加入商务时,他就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

助教育为己任”，这种思想贯彻始终。在 1919 年，他又对别人讲过：“弟生平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故不欲厕身于政界，后与粹翁（指夏瑞芳）相遇，以为得行其志，故甘为公司效劳。”（1919 年 10 月 8 日致高翰卿信）“得行其志”的“志”，就是“昌明教育生平愿”。所谓“昌明教育”，亦即维新派所说“开启民智”等，意思大致就是普及和提高社会文化，培养社会人才，这个“教育”并不仅仅指办学。当然，在北京做官时他就开始办学，办学与办出版，两者性质本是相近，而他似乎觉得办出版事业比办学校对社会更为有益。因此，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另在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中，把他在商务编小学教科书称为“可尽我国民义务”。从张元济“昌明教育”等一系列言论看来，他弃政而投身编辑出版活动，十分明确地有在文化出版方面为社会谋利益的意图，因而始终把编辑出版活动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他编辑思想的重要特色。商务作为企业不可能不重经济利益，但商务的编辑作风以严谨著称，这正与张元济的这种编辑思想有关。

关于向社会传播的文化内容，鉴于张元济从事编辑活动的时间特别长，因此需分前期和后期去看。大体说来，前期从 1902 年开始到 1926 年退休，后期便是在 1926 年以后。

在前期，诸多编务中张元济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介绍西方学术著作，二是主持编著和出版各类新式教科书和新式工具书，这两件事在当时都属于新学。除此之外，并非没有重要的，如他创办了《东方杂志》等许多种期刊，在中国属首创，这里姑且略而不谈。就这两件事来说，关于前一件事，由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上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张元济本人正是这潮流中的中坚人物，所以进入商务后，便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团结了一批介绍西方学术的第一流作者，如严复、林纾、蔡元培、伍光建、夏曾佑等，为商务形成强大而可靠的供稿队伍。其中如严复，他本是张元济

在北京结识的好友,严复第一个在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而严复所译8种“西方名著”,到1912年商务已全部出版。这8种“西方名著”中的《天演论》到1921年在商务已印刷20次,《群学肄言》到1919年已印刷10次,其余也都是一版再版。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介绍西方学术著作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关于编著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这件事,全部工作几乎都是馆内组织班子,在张元济亲自主持或领导下进行的。编印教科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各级各类学校用的教科书,还包括教授法、详解等与教科书配套用的教学参考书。工具书除英华、中德等双语词典外,有《辞源》于1915年、《植物学大辞典》于1917年、《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于1921年相继问世,以后不断有新工具书问世。在教科书和工具书方面,商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著规模之大,品种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内容、体例方面的新颖和适于应用,这又是商务教科书和工具书的鲜明特色,因而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普遍欢迎,行销全国,长期不衰。

从后期来看,张元济自1926年实践自己60岁退休的诺言后,他的编辑活动主要是编印中国古籍。在此之前,他在商务已编印古籍多种,退休以后则是全力以赴。他一生编印古籍的主要成就是四大工程,即《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这四项工程规模之宏大、范围之广泛、计划之周全,可与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相媲美,而校印质量之精致则又超过了它们。明清两代的这几项工程都是皇家敕修,动用了全国力量,像张元济那样以私家身分做如此庞大的工作,则为史所未见。这也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大的古籍整理工作。今天海内外研习中国传统文化需仰求古籍者,莫不受惠于张元济。

就传播的这些文化内容看,它基本上符合张元济为社会谋利

益、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编辑思想。他重视社会教育,因而成功地编印了新式教科书和工具书,对国家教育事业的进步起了作用;他介绍西方学术著作和整理编印古籍,有利于沟通中西文化和培养社会人才,同样具有“昌明教育”的意义。此外,如他创建东方图书馆、兴办学校、举办函授教育等,这些无不与他通过编辑出版活动在文化教育方面去为社会谋利益的意图相一致。

编辑通过传播文化去影响社会,其中包含着某种社会目的,所以传播不同的文化内容,有时表现为不同的编辑思想。张元济前期积极传播新学;后期致力于流通古籍,这是否表明他编辑思想起了变化呢?

在此,我们要联系张元济一生的思想情况去看。大体说来,他一生的思想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从最初戊戌变法时的君主立宪派,到辛亥革命时否定帝制拥护共和,接着又经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再到进入新中国后拥护社会主义。这60余年的中国历史,风云变幻、几经沧桑,时代的弄潮儿多少蜕变成历史的绊脚石,而张元济却能不断地随时代前进。他本是自信心很强的人,他走这条路并非没有矛盾和痛苦。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年代里,他既在商务接待了孙中山,又未能出版《孙文学说》,这里未免暴露了他作为戊戌变法中人在新形势下的思想矛盾。不过,他在辛亥革命时很快成为共和的坚决拥护者,拒绝做有利于帝制的事情。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师生陈独秀、罗家伦等猛烈抨击商务的出版物,这件事表现了一批商务早期创业者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已经存在着尖锐冲突。不要忘记张元济本人就是前清遗老,亲朋好友中守旧派人物是不少的。他的可贵处是能够勇敢地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坚决顺应时代潮流,大刀阔斧地改组了商务编译所。他起用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新人,如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等人在他手下得到重用。商务又在社会上吸收大批人才,如留美学生组织中国科学社和留日学生组织中华学艺社中的骨干分子,不少应聘